



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 “交流共同体”的内涵^{..}

□张今杰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摘要] 本文认为,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是在皮尔士的指导学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先驱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改造的结果,它包括“实在沟通共同体”、“理论沟通共同体”与“先验主体”等三种不同功能或内涵。本文将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学说作一粗浅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 语用学; 语言游戏; 沟通共同体; 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3)02-0039-05

20世纪60年代始,语用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部门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无不被打上语用学的烙印。在阿佩尔看来,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皮尔士的指号学实用主义和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使语言的意义问题完全地摆脱了句法语义学的分析模式,而库恩的“范式”理论也标志着科学哲学进入了典型的语用学维度之中。在深入分析了这些情况的基础上,阿佩尔提出了自己的以“沟通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先验语用学,实现了“语用学转向”。为第一哲学找到在当代条件下的第三范式。

一、阿佩尔语用学转向的理论背景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沟通共同体”概念的提出,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背景。从其表述来看,皮尔士的指号学实用主义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提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皮尔士曾创立三维指号学来进行“探究逻辑”的演绎。阿佩尔认为,“我们可以把皮尔士的哲学探究理解为对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指号学改造”,^[1]他认为,皮尔士的探究逻辑之意图并非自我意识客观的观念统一体,而是那种主体间有效的通过指号对客体的表达的语义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指号解释的维度(后为莫里斯称为语用学)中

才能被决定。可见皮尔士用以符号为中介的“一致性统一体”概念来取代康德的先验逻辑的先验统觉的“极点”。对此“一致性共同体”,皮尔士如此描述其特征:“实在概念的来源表明,这一概念本质上包含着一个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确定的限制,而且能够确定地增长知识。”^[1]这个“无限定的探索者共同体”概念取代了康德的先验统觉概念,于是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这一概念成为阿佩尔的“沟通共同体”的理论来源之一。

阿佩尔“沟通共同体”概念的另一重要理论来源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语言与游戏相通,语词的用法在不同的游戏中被构成。维特根斯坦的意图在于以用法来取代意义而形成一种有关“生活形式”的语用学。他说:“每个记号就其自身而言都是死的,是什么赋予了它以生命呢?——它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2]就是说,任何一个表述或语词的意义并非取决于该表述或语词指向的客体,而是取决于主体间约定俗成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革命性的洞见,即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或者说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去遵循一条规则。他认为:“私人语言”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根本不可能。这些所谓“私人语言”是一些无意义的

· [收稿日期] 2002-04-10 ·

.. [作者简介] 张今杰(1973—)男,湖南宁乡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师,浙江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记号,只有置于特定的语言游戏之中,才可能具有记载或表达的功能,但此时它们已成为公共语言。他进一步认为各语言游戏无共同本质而只有“家族相似”。阿佩尔认为即使是一个人的独白,也是主体间性的,因为他必须从自身中分离出一个在场的听者。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逻辑形式消解为构成语言游戏的无限多样性的基础的规则,把传统先验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具体化为由语言用法、生活形式和情境世界构成的体现为主体间性的功能统一体,成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的理论源头。

阿佩尔还深入研究了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一句在句法和语义上都很确定的话语,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含义,听者要领会其意图还必须联系说话者所处的特定的语境,或者说还必须经由语用学的考察,而语用学考察必须把语言作为言语行为来理解。他认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审判下被宣布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陈述,在语用学角度来看就是有意义的。他说:“对于一些无意义的陈述,只要能给出限定的条件,就能在谈论中接受它,甚至哲学家也能接受它。”^[3] 塞尔认为,语句或词语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言语行为才是语言交流的最基本、最小的单位。语言交往不是词语和语句的机械的集合,而是言语行为的集合。我们要理解一个言语行为,首要的条件是了解说话者当时所处的特殊的情境。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基于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的集合就成为说话者的语境,而这个语境是我们理解一个言语行为的背景。话语的意义通过语境而被赋予。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作了一些语用技术上的分析,这些属于经验语用学的范围,也成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先驱。

阿佩尔认为,句法-语义学的准先验概念“不得被一种(先验)语用学概念补充,这种语用学能处理通过语言而进行的关于语言的反思性交往的主体-主体间性的可能性条件。”^[4] 而莫里斯的三维指号学中的语用学维度,不具有与卡尔纳普的句法-语义学的准先验地位。它“只被当作经验科学的可能客体”^[4] 也就是说,从莫里斯指号学的语用学维度发展而来的语用学只是经验语用学。阿佩尔并不满足于停留在经验语用学的层面。他认为,只有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才能彻底医治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唯我论的痼疾。

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沟通共同体”概

念的内涵

阿佩尔在深入研究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皮尔士的指号学实用主义、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先验语用学。提出了“沟通共同体”的概念。

(一)克服方法论唯我论

阿佩尔“沟通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他对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唯我论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先验语用学”这一名称即可看出,阿佩尔思想中有康德、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等人的影响。实际上,阿佩尔一直都致力于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改造,致力于解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的问题。阿佩尔认为,要解决此问题,首要的是要克服“方法论唯我论”。

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阿佩尔列出了一个“方法论唯我论”的清单,从笛卡尔经康德到胡塞尔的主体性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榜上有名。

阿佩尔认为,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主体-客体的二元分裂,“从笛卡尔到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问题以及科学的逻辑与方法问题一直是根据人的认识的主客观关系这个基本哲学预设而提出并加以论述的”^[5]。

笛卡尔把知识的基础奠立于心灵与外在客体的关系上,其可靠性依赖于心灵的先天原则。作为“意识本身”的科学的主体在康德那里是可能的对象知识之先验统一的载体。他用先验逻辑取代了由洛克和休谟发展而来的知识心理学,提出了先天综合法则,即由知性、理性、直观、想象等心理能力的功能法则来取代休谟的心理学联想法则,这并未逃脱方法论唯我论的魔圈。阿佩尔认为,方法论唯我论不仅是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哲学的基础,而且也是构造语义学纲领本身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语义结构的科学语言为那些先天法则提供了新的主体。康德关于科学知识任何意识而言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似乎就由现代科学逻辑语义学给解决了。也就是说,“语言的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取代了康德的先天综合法则。”^[6] 因此,主体被还原成了科学的客体,康德主体的先验功能为科学语言的逻辑所代替;语言逻辑和命题或命题系统的经验证实一起,取代了康德关于客观经验的先验逻辑。阿佩尔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基于

自我来描述和说明其他科学的行为时,实际上把他人统统还原为研究的客体,而非与之具有同等地位和身份的共同体中的交往伙伴,这样他们就把主体间的“沟通共同体”打入了死牢,而对主体间性维度的忽视或取消都必然伴随着方法论唯我论这样一个产物。他们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而思想又是由一个个观念所组成,观念是因人而异的、私有的。他们希望通过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精确的科学语言来保障陈述的有效性,终止哲学家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由于他们的思想前提是:语词的指称作用是由人们赋予的,语词是人们观念的表达。因此阿佩尔也把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划入了方法论唯我论的阵营之中。

在阿佩尔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图像论是典型的方法论唯我论。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世界是我的世界”^[7]中的我并不存在于世界中,而是逻辑意义上的“自我”,是能够用科学语言加以描述的世界之界限,也即“主体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7]即自我的先验统一体就在于语言的先验统一体,后者又是自然科学之可能性和有效性的条件。这种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形式逻辑的还原使维特根斯坦摒弃了主体间沟通的先验语用学维度。阿佩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方法论唯我论”。如果在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先验自我或主体与世界具有有限界作用的语言之形式相同一,自我就无需任何关于语言用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解释的主体间交往了。

阿佩尔认为,以上方法论唯我论哲学有一个共同前提,即“单个人能够认识作为某物的某物,并依此来从事科学。”^[11]他们都用普遍性、必然性来取代对客观性的讨论,把主体所自以为是的东西推想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是方法论唯我论的特征。阿佩尔认为,他们的致命缺点在于屏弃了主体间沟通或交往的前提,而执着于主-客体的思维模式,把自我之外的人与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所以无一不落入方法论唯我论的窠臼之中。他指出:“无论是一种内省式地从意识内容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实在外部世界之存在问题的哲学,还是一种把语言设想为对实在的无反思描摹的哲学,都必定固守着方法论唯我论。”^[1]他认为,要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解决知识之可能性和有效性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克服方法论唯我论,而克服了方法论唯我论则意味着对主体间性的强调,意味着阿佩尔的“沟通共同体”概念便呼

之欲出了。

(二)交流共同体

在传统的知识论中,主体是语言符号的意义的赋予者。这种以方法论唯我论为特色的哲学传统经皮尔士的符号学改造之后,语用学的主体是什么呢?阿佩尔所提供的答案是“交流共同体”。他认为要摆脱方法论唯我论的纠缠,就必须加强主体间性的沟通,以“沟通共同体”的主体间性来取代传统哲学的主体性。

阿佩尔认为,共同体的概念并非意味着两个以上的成员的简单相加,而是知识或科学活动得以施行的有效条件的集合,这个集合既是知识的主体,又是知识从中获得客观有效性的参照准则的语境。“交流共同体”在科学认知和日常交往活动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具有不同的地位。他把“交流共同体”区分为三种功能,即“实在交往共同体”、“理想交往共同体”和“先验主体”,三种功能均内涵于“交流共同体”概念之中。

关于“实在的交往共同体”,阿佩尔认为,正如皮尔士所说的那样,它不能被还原为社会科学的客体,也不是康德或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本身,而是一个实在的可经验的实验和解释共同体,是一个无限的互动共同体中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阿佩尔指出:“实在的交往共同体”是在有限的特定的情境中从事批判性论辩的个体的前提条件,它不与那个无限解释共同体理想相符合,而服从于那些在不同民族、阶级、语言游戏、世界理解和生活方式中人类显示出来的意识和旨趣的限制。阿佩尔认为,把实在的交往共同体设定为知识的主体,就可以克服传统知识论的方法论唯我论。阿佩尔认为,科学主义通过意义沟通,用一种普遍的计算语言取代主体间沟通的日常语言。一切意义阐明活动均以一种具有日常语言形式的先行理解为前提并不能说明词语的意义,一切意义阐明活动均必须以一种具有日常语言形式的先行理解为前提,一种精确语言只是对日常语言的部分说明。被构造的语言必然是借助于主体间交往的日常语言才能被解释为对科学语言的精确化,并得以与实验经验联系起来。

阿佩尔认为,作为交往共同体的理想,必然在实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实在共同体才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无限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可经验的,一如其指号和行为是可经验的一样。但它决非经验的一个客体,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观察材料而从外部加以说明。它是关于观察材料之描述和说明的可能性和有

效性的概念性条件的主体间沟通的媒介。理想沟通共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作为一种有规范约束力的理想的前提,被设定在任何论辩中了,而且在任何历史给定的社会中,这种理想交往共同体始终都还是有待实现的。阿佩尔指出:从这一在解释共同体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照中就出现了实践进步的规整原则,解释的进步可能而且理当与这种实践的进步相交织。如果我们不能同意一种向着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实现前进的实践进步,那么我们就只有赞成伽达默尔的观点了,即在解释学的理解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而只有“差异性的理解”。在阿佩尔看来,科学之可能的的基础——一致性的主体并非一个在世界之外的“意识本身”,而是历史性的实在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只有当历史性的实在的社会被视为科学的潜在主体,且其历史性的实在总是根据有待在社会中实现的无限交往共同体的理想而同时在经验上和规范批判上获得重构之际,它才被充分地理解。

因此,阿佩尔指出:对文化的所有维度而言,至关重要的在是给定的生活形式中,并且面对在这些形式中的非理性的交往障碍,去不断地实现那种总是已经被设为先验前提的理想语言游戏。这种理想语言游戏是既有解释学意义,又有伦理学意义的规范。即使这种理想游戏没有被完全实现,或者被特殊社会的畸形状态所毁损了,我们仍须在任何语言游戏中把它设为前提。

阿佩尔认为,在任何一种可能的语言游戏中,语言性沟通本身先天地维系于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不能由约定来加以确定,相反,这些规则首先使约定成为可能。这些关于约定地确立的规则元规则,不属于任何特定的语言游戏,而属于无限交往共同体的先验的语言游戏。我们在谈论或进行实在的特定的语言游戏时,至少有一种语言游戏被先行假定为先验语言游戏了。各个不同的语言游戏对先验语言游戏而言是“给定的”可观察的对象。先验的语言游戏必须能进入所有“给定的”语言游戏并解释性地参与其中。这就出现了不同规则视界之先验统一体的问题。这个统一体不是给定的,但能在准经验的给定的语言游戏之间先天地创设一种交往联系,这就是阿佩尔所说的先验主体。

阿佩尔说:“为了用一种意义-意向哲学应付主体间有效的意义-意向的传统的第三世界柏拉图主义,我们需要重新介绍康德的‘先验主体’的理想。”^[14]阿佩尔的先验主体是在对康德的先验主体的改造的基

础之上形成的。他认为:“一个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的皮尔士改造的先验符号学,提供了超越和脱离唯名论和本质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和先验批判之间的二论的第三条道路。”^[4]这就是作为意义解释和可能知识的可能的主体间合理性的先验语用学。

在先验语用学的观点看来,哲学家首先必须投入某种“给定的”语言游戏中而不只是游离于语言游戏之外来观察它们。但是,他同时必须与之保持批判性距离,才能对这些在世界之中“给定的”语言游戏作出比较,而不沉湎于其中的一个。哲学家只有把自己维系于一种作为所有语言游戏之前提的先验语言游戏中,才能使得沟通的综合成为可能。

“沟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以上内涵反映了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先验反思特征。阿佩尔认为,一种当代的先验语用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对哲学论辩活动本身的意义的反思。通过论辩,他们根据一个无限沟通共同体的先验语言游戏为自己设立了知识的先验前提,作为一个论辩者,他总是已经隐约地承认了无限批判交往共同体这一前提。语言游戏没有旁观者,任何观察者都必须同时是语言游戏这一共同体的参与者,即我们对语言游戏的考察不足以构成“元考察”,而只能是语言游戏的自我考察。而且考察者又必须与语言游戏保持距离,才能存在对语言游戏进行批判反思的可能性。所以,先验的语言游戏是对语言游戏所作的一种先验的反思性的考察。而先验的论辩共同体则是先验语用学为了满足“终极奠基”的要求而构造出来的“先验主体”。按照阿佩尔的看法,如果我们只发挥语义系统的先天特性,而忽视指号的关系的先验主体,那么,我们绝不可能解释康德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认为一种‘先验的语言语用学’是可能的,在这种‘先验语言语用学’中,论辩主体能够对总是已被先行假定为言语情境之前提的论辩可能性和有效性条件作出反思。”^[4]因此,“主体事件的前概念决定于先验实用主义论辩,就其与康德的‘先验自我反思’的方法一致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先验的’^[4]也就是说,反思一个人自己的思想的合法性条件,要反思如下事实:我作为论辩思想的意义,不仅是由于我意识的综合功能,而且是由于语言的公共意义而可能。因为远离康德主义和现代语义学主义,我们的论辩预设了主体间有效的思想的主观结构由语言的公共意义而部分决定,这种语言的意义却部分地依赖于意义意向的人类主体的解释。因此,我的论辩就成了实用主义的论辩。意向的主体通过指号解释

而享有了公共意义,或者说,意向的主体通过意义的指号解释而融入了主体间沟通。因而作为主体的“我”的个体意向性以蕴含于语言指号中的主体间性的公共意义为前提。个性意向性论断的主体间有效性必须诉诸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才能证实。故,“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是意义意向性的先验主体。”^[4]阿佩尔认为,指号解释的无限共同体作为先验主体,保障了自我反思式知识的主体间有效性的可能性。

三、结语

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出发点在于阐明用先验语用学的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的必然性,使康德的先验哲学转换到语用学的维度上来。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新发展结合起来。他对康德哲学的改造,并未否定传统的康德式先验哲学的意义,而是通过以语言“沟通共同体”为中心概念的先验语用学融合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从而最终实现“语言学转向”的实用主义完成,为第一哲学找到在当代的第三范式。阿佩尔并未局限于经验主体的问题,而是论述了交流共同体的先天性,是“康德伦理学的先验实用论的转化和康德的先验逻辑的符号学转向,有其适应当代社会的进步性。”^[8]在我看来,阿佩尔在改造康德先验哲学过程中对方法论唯我论的批评和对“沟通共同体”的论述,使语用学脱离了经验描述的层次而达到“先验主体”的终极奠基。另一方面它也

改变了欧陆先验人文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期互不往来、各行其是的传统,哲学界出现了对话和交流的可喜局面,阿佩尔的工作为两大传统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为当代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出了一条有价值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孙周兴,陆兴华译.哲学的改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2. 101.172.175.
- [2]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Blackwell, Oxford, 1958.23.
- [3]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1962.2
- [4] Karl - Otto Apel, Selected Essays: Towards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M]. Vol. 1. ed. Eduardo Mend- ieta.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4. 64. 135. 141. 153.312. xvi
- [5]阿佩尔. 社会科学的解释学向度及其规范基础(上)[J]. 国外社科信息, 1993, 2(7): 25-26.
- [6]盛晓明.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182.
- [7]维特根斯坦. 郭英译.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5. 641.62.
- [8](台湾)赖贤宗. 阿培尔的言谈伦理学中的“理性事实”与其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J]. 思与言, 1999, 1.

On Intension of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of Apel’s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Zhang Jin - ji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two clues which mingles with each other of the “linguistic turn” in western philosophy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People alway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lue of artificial linguistic philosophy’s development which represented by logical positivism. But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ragmatics turn which develop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everyday language. Apel’s concept of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which is based on pragmatism semiotics of pierce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game of Wittgenstein and speech action theory of Austin and Searle is an outset of a transcendental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of Kant. It contains these functions: real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ideal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and transcendental subject.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of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 of Apel.

Key Words pragmatics; language game;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speaking action

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交流共同体”的内涵

作者: [张今杰](#)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3, 5(3)

参考文献(8条)

1. 卡尔·奥托·阿佩尔;孙周兴;陆兴华 [哲学的改造](#) 1997
2.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8
3.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 1962
4. Karl Otto Apel [Selected Essays:Towards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 1994
5. 阿佩尔 [社会科学的解释学向度及其规范基础\(上\)](#) 1993(07)
6. 盛晓明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 2000
7. 维特根斯坦;郭英 [逻辑哲学论](#) 1985
8. 赖贤宗 [阿培尔的言谈伦理学中的“理性事实”与其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1999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303009.aspx